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1949–1956年）

陈迎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102）

［摘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建立新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地建立了一些研究和教学机构，创办了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期刊，这为今天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首要出发点是配合当时中国的对外斗争，因此体现出了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较深、政治性突出、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等特点。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苏联模式；外交学中国化；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2)03-0088-07

国际问题研究是透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面镜子。从 1902 年中国第一份专业刊物《外交报》开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已经走过了 110 年的历程。这 110 年的学科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02–1949 年；第二阶段，1949–1978 年；第三阶段，1979–2012 年 。其中，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科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展、特征以及时代局限，学界相关论述不多，偶有论文涉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时候难免有片面、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因此梳理、评析建国初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展与缺失，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又能为今天建设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学派”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一、“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命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仅意味着政权的变更，也包括学统的变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崭新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非常严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当时的决策者也希望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新生与再造，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展外交活动提供智识上的支撑。

因此，1949 年 1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但是现在还做不到。”[1](P.1)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P.285)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中国高层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甚至亲自参与到中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之中，对当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起步，影响甚为深远：首先，这些讲话明确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指导方针，从而与旧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划清了界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其次，它们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的、庸俗化套用，而是要求在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中国化”则成为这一命题的核心要求。再次，它们指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要具有开放性意识，要敢于兼收并蓄，不仅仅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成就也要批判地予以接纳。最后，它们要求建立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新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创之初，就意识到了学科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意识到了理论研究应该讲究科学、重视学术逻辑。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例如,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苏联外交史》作者、《文史哲》杂志创办人华岗于1955年被捕入狱,《人民日报》曾批华岗为“冒牌学者”。因此，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层领导人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上述讲话精神未被全面、完整地坚持下去，从而导致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走过了一段曲折、徘徊的道路。

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包括教学与科研机构、专业期刊杂志等。建国初期，中国相继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南洋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专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一些涉外社会团体也承担了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工作，同时，一系列专业杂志相继创办并刊发了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的大量成果，因此，我们认为，建国初期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已经初具雏形，为后来乃至今天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教学与研究机构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虽未取得全国性政权，但出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也十分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因此党内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如张闻天、董必武、乔冠华、羊枣、胡愈之、金仲华、刘思慕等，而毛泽东本人对国际事务也有着深刻的了解。例如，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访问延安期间，就曾注意到毛泽东“对世界政治十分精通”。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因此更加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从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至1956年底，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中国相继组建了一些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尽管它们尚处于初创阶段，但毕竟为后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一个必要的铺垫作用。

1. 国际问题教学机构的初创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前身）成立，它是当时解放区的最高学府。华北大学设有政治研究室，由当时的华北大学教务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1949年，中原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设立政治教研室，下设世界政治研究组，陶军为研究生讲授国际关系课程，并编写教材《国际三十三年》。同年12月，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并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培训班学员有韩念龙（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姬鹏飞（第三野战军南京警备区司令兼政委）等11人，并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王铁崖等专家学者系统讲授国际法与外交史等课程。[3] 当然，新中国成立前后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办的这些教学机构，大多带有短期培训色彩，谈不上有系统有计划地培养国际问题研究人员。

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就设置了外交系，并下设国际法、外交通史、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政策、大使与领事馆等教研室。1951 年 6 月，中央军委外国语学校（今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成立，为军内培养外语、军事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人才。1955 年，原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单独编制，组成中国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组建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同一时期，其他一些高校如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也比较重视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相关知识的教育工作，先后以各种形式开设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课程、讲座等。例如，1955 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改称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党校），其主要任务是轮训党的高中级干部。为扩大学员的视野，中央党校有组织地聘请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如乔冠华为学员做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讲座，深受这些学员的欢迎。时任建筑工程部财务司长的顾准在其日记中记载：“星期六（1955 年 10 月 30 日）听了乔冠华的报告，列举了两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和资本主义阵营内各国家的动向，很精辟。”[4](P.12)

2. 国际问题研究专业研究机构的组建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陆续组建一些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科研机构。1956 年 10 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也是我国最早组建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不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在当时主要侧重于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地区性特色。

而对国际问题展开全面而又系统研究的，则始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创建，是与张闻天的大力推动分不开的。在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张闻天以其筚路蓝缕之功，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起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闻天是我党著名理论家，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以及卓越的外交才干。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主编《解放周刊》,兼任《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央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院长等职务。为了开展国际宣传，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就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历史上第一个外文刊物——《中国通讯》，用英、俄、法三种文字出版。1944 年整风结束后，他领导中央政治材料室编辑《参考资料》，对国内外大事进行系统研究。从 1950 年起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开始转到外交战线上来。他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就组建了国际问题研究室，这是中国驻苏使馆内最大的一个单位。[5](P.352) 在 1955 年、1956 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组建了三个各有分工但又互相配合的机构：除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有一所学校即外交学院，一家国际问题书刊出版社即世界知识出版社。[6]

这样，经过张闻天的不懈努力，1956 年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得以组建，三年后该所出版发行《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闻天后来还提出关于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的具体方案，比如编写《中国对外关系史》教材等，他甚至还反对将当时公开出版的《世界知识》列入内部读物。[7](P.76) 时至今日，外交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引领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步。可以说，张闻天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当之无愧的杰出楷模和奠基人。但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直言“大跃进”的失误而被错打成“右派”，他担任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也随后被撤销，从此淡出中国政治舞台。张闻天政治生涯的黯然终结，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党内另一位理论家王稼祥对中国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际问题研究的进步同样功不可没。1951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处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任命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王稼祥深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专业人才的缺乏，无法适应中国了解世界政治形势的需要，因此他曾在部务大会上对中联部的研究工作做出如下要求："研究工作首先要抓材料，各个研究组自己要多想办法去找。对于每一个国家的研究要有重点，因为人少，不可能一切都加以研究，要有偏重，即偏重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研究。为了研究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必须了解各国的国情。"他还希望中联部的研究人员"用马列主义方法先写专题材料，将来还可写书，但要写得好。我们的目的是要大家成为专家，因此大家要安心地长期做下去。"王稼祥还预见到："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论现在和将来，都需要这样一批专家。"[8](P.407) 在王稼祥的直接领导下，中联部除了开展党际交往外，还逐渐出现了一批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3. 涉外社会团体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组建了一些涉外社会团体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苏友好协会等。这些团体除了配合总体外交、参与外事活动外，还研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为中共中央的外交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它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人民外交的社会团体，陈毅、邓小平、乔冠华、陈翰笙等都曾是外交学会的会员。外交学会在新中国初期的外事活动中十分活跃，它的领导人如著名政治学者张奚若经常陪同国家领导人参与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外交学会的初期工作主要侧重于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供外交政策建议。为此，外交学会设有两个委员会，即研究工作委员会和编译工作委员会。同时，根据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中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外交学会还设置了相应的研究小组，各个研究小组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如"国际形势问题研究小组"、"对日和约问题研究小组"、"帝国主义在华权益问题研究小组"等。[9] 因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新中国第一个准"外交思想库"的角色。它的成立，既有利于当时民间外交的开展，也直接推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

（二）期刊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较少，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以内部报告或内参的形式出现，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受众十分有限。不过，仍有一些杂志、报纸等公开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外交的文章，成为当时学者展现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这些杂志主要有：

《世界知识》杂志。1949 年《世界知识》复刊，并由上海迁至北京，是建国初期最负盛名的国际时政杂志。许多著名的外交问题研究学者如胡仲持、金仲华、刘思慕等以《世界知识》为阵地，评述重大国际时政问题，他们成为建国初期中国最为杰出的一批外交问题研究学者。其中，金仲华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相继成立，今天，这两大专业机构仍然居于中国一流的国际问题研究思想库之列。

《国际展望·和平月刊》杂志。《和平月刊》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各国的机关刊物。在中国，该杂志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办，并由国际展望杂志社出版、发行。该杂志主要介绍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同时也刊发国外学者关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研究的文章，如罗米西·钱德拉的《不准干涉台湾——关于"台湾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等。

《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杂志。1952 年 1 月，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在上海正式创刊。《中国建设》刊发了一些有关国际问题与中国外交的文章，如著名社会活动家宋庆龄女士曾为《中国建设》创刊号写过《福利工作和世界和平》一文，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而南亚问题专家陈翰笙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以通俗、流畅、深刻见长。《中国建设》杂志后来以英文等五种外文出版，发行量一度高达20万册，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被美国列入禁止进口名单。

《人民中国》杂志。1950年《人民中国》杂志创刊，由精通国际事务研究的乔冠华担任主编。《人民中国》除了刊发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讲话外，还发表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国际问题与中国外交的评论性文章等，如季羡林的《中缅友谊的新发展》、艾兰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林达光的《美国对中国的颠覆》等。这些文章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其他杂志如《学习》、《展望》、《新建设》、《时事手册》、《外事研究》等杂志作为当时中宣部和外交部主管的大型理论刊物，定期或不定期地发表了为数较多的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文章，它们起到了普及国际问题知识、宣传中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进步。

三、研究特色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配合外交活动的需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起来，为此后国际问题的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科发展史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但由于深受当时特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本时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工作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比较突出的时代特色。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建国初期，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模式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国内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以苏联为师的热潮。刘少奇曾在欢迎苏联专家大会上讲：“苏联专家远道而来……我们要把他们当很好的老师……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10](P.10)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聘请了大批的苏联专家作为办学顾问，指导各个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苏联的教学经验与研究模式对中国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着直接的影响，无怪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把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视为“苏联体系的继子”。[11](P.576)

苏联专家对中国高校教学与研究的指导可以说是细致入微。例如，中国外交学院的苏联专家列·库达科夫曾对中国外交学院的学位论文以及研究著作的规范化（包括论文的基本要求、选题、结构、材料引用等问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比如，他亲自起草的一份意见书认为，“论文的基本要求是简单、明了”，“论文的结论要令人信服”，“辛辣的语言不应流于粗暴的谩骂，特别是要防止那种以夸大的但毫无内容的词句来暗中代替富有内容的尖锐的批判”。[12]

与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相比，中国学者对于英美世界的国际问题著作关注甚少，偶有零星著作问世，其主题也是以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侵华历史罪行为主。根据张闻天的统计，从全国解放后到1956年3月止，由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社翻译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问题著作，一共只有66种。这些著作的作者不是共产党员，就是知名的进步人士。资产阶级学者和作者的著作，即使确有权威性或者材料知识很丰富，一般都不敢翻译出版（曾经出版过《奥本海国际法》，没有公开发行；曾经翻译过《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仅仅作为内部参考），以至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极为贫乏闭塞，孤陋寡闻，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更是抄袭苏联，人云亦云。[13](P.21)

第二，强调国际问题研究的政治性，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政治立场上必须“正确”。关于学术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政治（特别是政策制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曾有比较经典的论述："尽管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和政治外交实践可以相互补充，但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牢记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区别：学者力图用理论说明各种现象，决策者则必须根据一系列具体情况选择一个行动路线，对后者而言，可能性分析不一定有多少帮助。"[14](P.26) 这表明国际问题研究虽然源于国际政治实践，但却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然而，建国初期，由于受限于当时那种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是从属于政策性的，研究工作高度强调"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和极其强烈的政治感就成为当时国际问题研究类文章的重要特征。"政治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宣传党和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党和政府政策的需要；二是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一切研究与分析的权威依据与出发点。至于学术性，则更多地强调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应该与政策层面保持一定的距离等。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性就从属于政治性，注重研究成果的政策价值，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向外界传递党和国家的政策，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否则，就会在政治上被视为"不正确"。例如，曾有一些零星文章披露了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疆发生变化的真相，尽管这类文章并非深层次的探讨与剖析，但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文章的作者先是被指责为反苏，后又被卷入"反右斗争"的浪潮而受到批判。[15]

第三，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主要以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方法为主。

研究方法是专业研究工作者的必备工具。在研究方法上，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起步阶段，许多学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在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呼吁"团结起来，发展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因为"只有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指导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6](P.237) 因此，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成为当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最重要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他们主要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的方法，推崇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的分析途径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经典著作中的理论与词句，对某个具体的国际政治事件进行诠释。尽管当时也翻译了一些介绍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著作，但至多属于了解甚至是批判之列，这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可能在研究工作中得到真正运用。因此，由于时代的局限，总体上看，建国初期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显得比较单一、薄弱，远未形成多元化共存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5)[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 世界知识编辑部．脱下军装换正装：将军当大使[J]. 世界知识，2009(19).

[4] 陈敏之，顾南九．顾准日记[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何方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 萧扬．忆张闻天创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J]. 世界知识，2006(17).

[7]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8]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 谢黎．忆新中国第一个人民外交团体的诞生[J]. 外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交学院学报，1989(4).
[10]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中国领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11] David Shambaugh,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 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J].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02, No. 17.
[12] [苏]列·库达科夫.关于“国际关系”方面的学位论文和科学著作的写作问题[J].教学与研究，1956(6).
[13]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4)[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14]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5] 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J].历史研究，1999(4).
[16] 董必武.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齐琳）

·学术信息·

我院学报编辑部赴北京大学调研座谈

2012年5月23日上午，学报编辑部全体成员及图书馆相关老师一道赴北京大学图书馆调研，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计量学研究室主任、《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主编何峻老师进行了友好的交流与座谈。

何峻老师详细介绍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评价标准及评审流程，并指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其研制目的主要是为各图书情报部门的中文期刊采购提供较重要的参考工具；它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具体做法是：先进行定量评价，得到初选核心期刊表，再请学科专家对初选期刊表进行评审，纠正偏差。以定量评价为依据，以定性评审为补充，最终得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学科核心期刊表。何峻老师还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遴选原则、遴选依据、遴选数据指标对学报今后办刊提出了科学的指导建议。

此次调研座谈对我院学报的办刊工作具有切实的促进作用。

（卷平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